

· 序跋与书评 ·

# 开启唐诗接受研究新路径的一部力作

——评沈文凡教授《唐诗接受史论稿》

曹丽芳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大连 116081)

文学学和学术史的研究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文学领域也早有集注、集解、集说、汇评等多种与接受研究相关联的表述形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源于德国的接受美学逐渐被应用于我国古代文学研究,学者们自觉地将西方的美学理论与历史悠久的本土实践结合起来,使许多传统命题在转变观照视角后重新显露出巨大的探索空间,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一度呈现出繁荣可喜的局面。在此背景下,唐诗研究者也很快认识到唐诗接受史不仅是唐诗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接受史中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于是唐诗接受研究论著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著名作家和经典作品的接受史也日益成为博士、硕士论文的热门选题,除了数量繁多的单篇论文之外,还产生了一大批标志着这种中西合璧的研究方法渐趋成熟的专著。随着时间的流逝,热闹终将归于平静。如今,当年那种许多人一拥而上,用大致相近的方法,在各个重要时段、各位大家、各种流派等方面迅速出成果的局面已不复存在,颇有一些学者认为文学接受史的研究已经过时,因而转向了其它方向或领域。但是,真正科学且适用的文学研究方法是不应有过时之说的,它一旦开辟了一个宽广的、正确的研究方向,必将会有众多路径指向一个又一个柳暗花明的崭新的认识境界,让文学发展长河中曾经一度被遮蔽的景观重现于人们的视野。只是新路径的找寻和开辟需要更多的智慧、信念和毅力,不是所有能在短时间内接受新方法的人都能坚持走下去的,沈文凡教授则是一位具备这些素质而直到今天还在唐诗接受史领域孜孜以求并且开疆拓土,成果丰硕的学者。

近读沈教授的新著《唐诗接受史论稿》,既收获新知,又启迪思路,获益良多,深感这是一部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不仅斩获了许多新的论断,而且开启了诗歌接受史研究可以深入前行的无数路径的专著。余恕诚先生在此书《序言》中说:这部著作“精细了唐诗接受史研究的对象,拓展了唐诗接受史研究的范围,开阔了唐诗接受史研究的视野,体现出阔深丰厚的学力、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执着专注的治学精神,为唐诗接受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范例,为后学者进一步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许多新的重要资源,它的出版是唐诗接受史研究的一个令人欣喜的重大收获”<sup>[1]</sup><sup>5</sup>。余先生的解读和评价全面准确、切实中肯,令人敬服。笔者在完全赞同余先生的观点之外,拟谈谈此书在开启唐诗接受史研究新路径方面给人印象最深的几点特色。

首先,这是一部中心明确的唐诗研究著作。尽管作者治学的角度因地制宜,千变万化,但千回百转围绕的中心始终是唐代诗歌以及由此延及的唐代文化。文学接受史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门独立学科,陈文忠先生曾有如下定义:“接受史就是诗歌本文潜在意义的外化形式的衍化史,是作品在不同阶段经读者解释后所呈现的具体面貌,也就是读者阅读经验的历史。”<sup>[2]</sup>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研究诗歌,其旨趣、方法和结论可以指向不同层面,比如可以以接受者、接受规律、接受前代经验而产生的后世作品等为中心进行研究,但这部著作中所有的文章,其指向都是唐诗,作者坚持追寻的是唐诗是如何接受前代文化遗产以成就自身面貌的、唐代诗人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的、唐诗的艺术价值是如何经由接受过程而

收稿日期:2015-04-27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晚唐骈文演变的文化考察”(项目编号L12DZW021)。

作者简介:曹丽芳(1969—),女,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唐代文学。

逐渐形成的等以唐诗为中心的学术问题。比如,众所周知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家庭,他虽然曾对道教、佛教都有过兴趣,但正如莫砺锋先生所说:“他终身服膺且视为安身立命之所的则是儒家思想,是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早期儒家思想。”<sup>[3]</sup>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致君尧舜、仁民爱物等品格不仅贯穿于他的思想和行为,同时也是他诗歌的精神支柱。宋代的王彦辅说:“子美之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涵今,无有涯涘。”<sup>[4]</sup>那么,在诗歌创作方面,杜甫是如何从儒家思想的奠基之作《论语》中汲取精神要义以成就这“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sup>[5]</sup>的呢?在《〈论语〉铸就了“诗圣”杜甫》一文中,著者从惻隐仁者心、日暮倚修竹、白首甘契阔三个角度追索了杜甫的仁者情怀、君子品格、志士精神与《论语》之间的渊源关系,清晰地疏通了先秦儒家思想与杜甫诗歌之间的传承脉络。诗人之间的影响和接受不必等到几百年之后的异代,而是始于诗歌作品产生、传播之日的。同时代诗人之间的互相接受情况更复杂,也更能反映出文学接受中的一些普遍规律,这一点在崔颢《黄鹤楼》诗的创作、接受过程中有明确体现。《〈黄鹤楼〉诗在接受——以崔李竞诗为中心》一文通过梳理、辨析史料以及严密的理论思辨,不仅清晰地展示了沈佺期《龙池篇》,崔颢《黄鹤楼》,李白《鹦鹉洲》、《登金陵凤凰台》之间的借鉴、争胜关系,而且以实际事例证明了接受史中存在着“正是后辈诗人的成就与光彩使人们关注前辈诗人的诗作,使人感到了前人的伟大与不可或缺”<sup>[1]36</sup>的一般规律。

接受美学认为“大部分的创作群体或个体,其创作的价值并不是在产生之时就全部显现出来的,有不少是在作者身后才被发现,甚至是被附加的”。“作家的历史地位与作品的艺术思想价值不是超越时间和空间而被给定的客观存在,它只有通过社会传播和读者接受才能体现出来。”<sup>[6]</sup>过去我们对于诗歌史的认识与研究偏重于创作史,忽略了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虽然诞生于其创作过程完成之时,却存在于历代读者持续不断的审美接受中这一基本事实。沈文凡教授充分意识到文学接受环节对于文学文本意义的生成和延续的重要性,试图通过厘清在接受环节中的种种具体细节,来加深人们对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动态地增损意义的唐诗文本的认识,这无疑是一个科学而符合历史事实的研究思路。此书中所收录的《唐诗名篇名句之明代接受与传播》、

《白居易诗歌的影响与接受》等文,旨在通过对明代唐诗接受中各种微观情形的研究,来考察唐诗中的具体个案是如何经由明人的解读、传播而延续它们的艺术生命的,文中随处可见能启迪思路的独到见解,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其次,这部著作特别注重对“参与性接受”的研究,可谓抓住了接受史研究的重中之重。陈文忠先生对于文学接受层面和研究方向曾作过明确划分:“一般说,人们对艺术作品的接受可区分为相互联系的三个层面:作为普通读者的纯审美的阅读欣赏;作为评论者的理性的阐释研究;作为创作者的接受影响和摩仿借用。与此相联系,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也就可朝三个方面展开: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效果史研究;以诗评家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以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sup>[7]</sup>其中的第三个层面“创作者的接受影响和摩仿借用”特别得到了沈文凡教授的重视:“在接受史意义上,作为受诗歌文本影响而进行的诗歌创作,也即‘参与性的文学接受’,不仅包括后世文人在阅读的基础上吸收艺术和思想精髓,重新进行艺术创造而形成的诗作,而且还不能忽略对诗歌本文及作者进行评论性质的诗歌作品。……这两种诗作,正是诗歌文本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影响的直观表现,也正是由此不断地创作——接受——再创作,才有了中国古代诗歌薪火相传的发展和演变,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特点。”<sup>[1]56</sup>的确,后人把对具体诗人的接受付诸于诗歌创作之中,是一种最有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接受方式,对前代作品的意义非同寻常,不仅能发掘、彰显前代作品沉埋已久的文化内涵 A 和价值,有时甚至能为前代作品附加上新的意义,所以接受史研究只有重视创作接受史,才能更好地挖掘出最接近原始的文献材料,将影响与接受、发展更好地联系起来。此书中无论是探讨名家、名篇还是名句;也无论是史料爬梳,还是理论阐释,都侧重于对影响史的研究,其中特别重视对名篇、名句“接受小史”的关注。早在2008年,沈文凡教授就出版了《名家讲解唐诗三百首》(长春出版社,2008年版)。这是一部在众多《唐诗三百首》的注本中独辟蹊径、独具特色的“全新的注本”,而“所谓‘全新’是指在文学总集注本中有意识地发掘具体某一作品的‘接受小史’研究,这是前此所有文学总集注本几乎没有人关注的课题。所谓‘接受小史’,作者在《前言》中解释说:是指后代诗人从创作上继承、借鉴三百首中名篇的情况,这是‘名诗’和‘名句’传播和被接受过的

程”<sup>[8]</sup>。这种研究相对于前此的以时段、流派、名家为对象的接受研究,确实是精细到了一个崭新的程度。而收在《唐诗接受史论稿》书中的几篇文章则更进一步细化到了诗韵,如《杜甫五律、五排诗韵之明代接受文献初辑》、《唐代诗韵之明人接受文献初辑》等,展现出一个广阔深邃而饶有意味的研究领地。

第三,注重对原始文献进行竭泽而渔式的辑考,注重从第一手材料中提炼出真实可信的观点。随着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不同学者的学术专长也都有了用武之地,有的擅长理论构建,有的擅长艺术感悟,但正如葛晓音先生所说,任何一种研究都应该“老老实实地阅读第一手资料,从大量事实中抽绎出观点,然后反复提炼、反复琢磨,再形成文章。尽管现在流行各种新方法,我仍然认为,治学只有从原始材料出发,寻求最接近历史事实的结论,才是唯一可靠的方法”<sup>①</sup>。无论用什么方法、得出什么观点,都必须有大量第一手材料作为依托,扎实的文献支撑是一切研究的基础。资料的取得与运用,决定研究品质的高下,掌握了全面可靠的资料,方可提高研究水准。沈文凡教授非常重视对接受史文献的钩沉整理,在辑考、辨别文献方面用了很多功夫。排律的产生、发展及其性质是沈先生持续关注的一个课题,他有关排律的所有研究无一不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之上的。早在《排律文献学研究(明代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中,沈先生就以70余万字的篇幅对明代排律文献作了穷尽式的考述,其中包括明代诗人对唐代排律的认定与明代诗人本身对排律作品的解读、编辑、整理、刻印以及他们自身的排律创作,在大量的文献基础上,再探讨明人对唐代排律这一诗体的继承和发展,由博返约,溯流探源。收在《唐诗接受史论稿》书中的文章也再次体现出沈先生对基础文献的重视。比如,虽然排律之实在初唐已有,但其名称却晚到元代杨士弘的《唐音》才得以确立,对这一文体的明确认识则要到诗歌分体意识高涨的明代。在《“长律”“排律”名称之文献辑考——以唐宋元明时期为考察范围》一文中,著者详细考察了“分体意识与唐以来按体裁编排的别集与‘长律’‘排律’概念”的相关文献、“限定在‘排律’含义之下的‘长律’文献”以及“直接使用概念限定严格的‘排律’文献”等多方面的材料,旨在“充分利用明代已有的‘分体’诗成果,通过学习、体验、把握、挖掘诗人的分体意识及分体做法,来返观前代,特别是唐代诗歌的分体情

况”<sup>[1]149</sup>,使得关于这一文体的来由、性质、发展脉络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基本上得以澄清,因为资料翔实、论据充分,所以观点真实可信。再如《白居易与“长庆体”明代诗歌接受文献辑考》一文,将有明一代效拟元和体、元白体、白乐天体、白傅体、长庆体、香山体、白体诗等的相关文献搜罗殆尽,一方面展示了白居易在明代广为人知的巨大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为白居易诗歌的接受研究指引了许多可以继续前行的方向和思路。

第四,将唐诗接受史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域外。现有的接受史研究基本是在我国本土范围内做历史性考察,揭示我国文学接受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而沈文凡教授则把视角延伸到了亚洲汉语文化圈。书中特意设置“域外亚洲编”部分,对于唐诗在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受容和影响作了全面细致的探讨,扩大了研究的视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现了唐诗以及唐代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日韩两国与唐王朝有密切交往,都曾派遣过大量的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到唐朝来进行文化交流。这些人一方面受唐朝文化的影响,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另一方面他们也将唐人的诗歌带回了了自己的国家,形成了唐诗的域外传播,这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是唐诗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沈文凡教授从扎实的文献勾稽入手,对日韩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在唐代的诗歌创作情况进行了宏观的描述,并提出了深入研究的内容、思路和步骤:“研究工作的初期,将类别化地处理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在唐所作诗文,将对搜集来的诗文资料进行笺证;中期,在上述工作完成之后,对日韩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的创作轨迹进行描述;后期,扩展其理论空间,并将其与文化传播联系起来。”产生于15世纪中叶的俳句是日本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文学体裁,它在遣词造句与谋篇布局方面受到了唐诗多方面的影响,但因两者生存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加之两国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使得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很显著。《日本俳句与中国唐诗艺术表现之异同》一文,就仔细分辨了两者之间的同与异,并具体分析造成差异的原因,从一个侧面探讨了诗歌创作与诸外在文化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另外,书中还着重辑考了唐诗名篇名句日本江户以来受容文献、日本江户以来题李白图像、咏李白瀑布诗文献、杜甫名篇名句日本江户以来受容文献、日本江户以来的排律(长律)创作文献等,为唐诗在域外的接受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越南古称交趾、交

州,唐高宗时期,在交州设置安南都护府,因而又改成安南,归唐朝中央政府管辖,一直到公元十世纪,越南建立了独立的封建制国家,但其仍然是中国的藩属,长期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唐诗的艺术成就对越南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收录在此书中的《越南十世纪到二十世纪对唐代绝句的移植与发展》一文,通过探讨绝句在越南的创作、发展、传播和创新,审视了中国文化与越南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融以及由此滋生的当代价值意义,也体现出著者思路的广阔以及开拓精神。

综上,笔者认为沈文凡教授的《唐诗接受史论稿》是一部以唐诗研究为中心,以文献辑考为基础,拓展了唐诗接受史研究新视野,开启了唐诗接受史研究新路径的力作。书中所体现出的严谨的态度、灵活的方法、执着的毅力、坚韧的精神都值得我们思考和效仿。唐诗接受史研究是沈先生持续关注的话题,还有许多计划中的项目正在进行中,我们期盼沈文凡教授在这一领域不断给学界

呈现新的研究成果。

#### 注释:

① 转引自沈文凡《唐诗接受史论稿》,第5页。

#### 参考文献:

- [1] 沈文凡. 唐诗接受史论稿[M].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
- [2] 陈文忠. 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刍议[J]. 文学评论,1996(5):128.
- [3] 莫砺锋. 杜甫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278.
- [4] 蔡梦弼. 杜工部草堂诗话·卷一[M]//丁福保,辑. 历代诗话续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3:194.
- [5] 闻一多. 研究论文集(第一辑)[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3.
- [6] 尚永亮,等. 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上卷)[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2.
- [7] 陈文忠. 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13.
- [8] 陈冠明,程欣. 唐诗接受史研究模式与事例的创新[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0(1):62.

[责任编辑 燕朝西]

(上接第101页)

- [5] 陈玉珍. 英语专业高低年级学生词典使用技能比较研究[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2007(10):38.
- [6] 陈玉珍. 关于高校英语专业开设词典使用教学课程的若干问题——英语词典使用教学探讨之一[J]. 辞书研究,2007(6):113-122.
- [7] 陈玉珍. 当前英语专业学生词典使用培训的途径——英语词典使用教学探讨之二[J]. 辞书研究,2008(3):124-134.
- [8] 陈芳,王蕾,陈则航. 电子词典应用于高中英语教学的实证研究[J]. 中国电化教育,2010(10):85.
- [9] 安德源,刘伟乾. 第二语言学习者双语词典使用技能的实证研究——以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汉语本科专业留学生为例[J]. 民族教育研究,2012(5):63-67.
- [10] 谢红莲,张锦文. 高职英语专业学生词典使用技能培养之实证研究[J]. 辞书研究,2012(4):46-53.
- [11] Dziemianko A. . Paper or Electronic? The Role of Dictionary Form in Language Reception, Production and the Retention of Meaning and Collocat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 2010,23(3):257-273.
- [12] Dziemianko A. . Does Dictionary Form Really Matter? [C]// K. Akasu and S. Uchida. *Lexicograph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Kyoto: Asian Association for Lexicography, 2011:92-101.
- [13] Lew Robert & Gilles - Maurice de Schryver. Dictionary Users in the Digital Revolu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 2014,27(4):7.
- [14] 刘珊,姚范美. 英语词块强化注意教学模式的实证研究[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05-109.
- [15] 彭秀利,郝志平. 艺术类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现状调查与思考[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81.
- [16] Allen V. F. . *Techniques in Teaching Vocabulary*[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2:83.

[责任编辑 肖 吟]